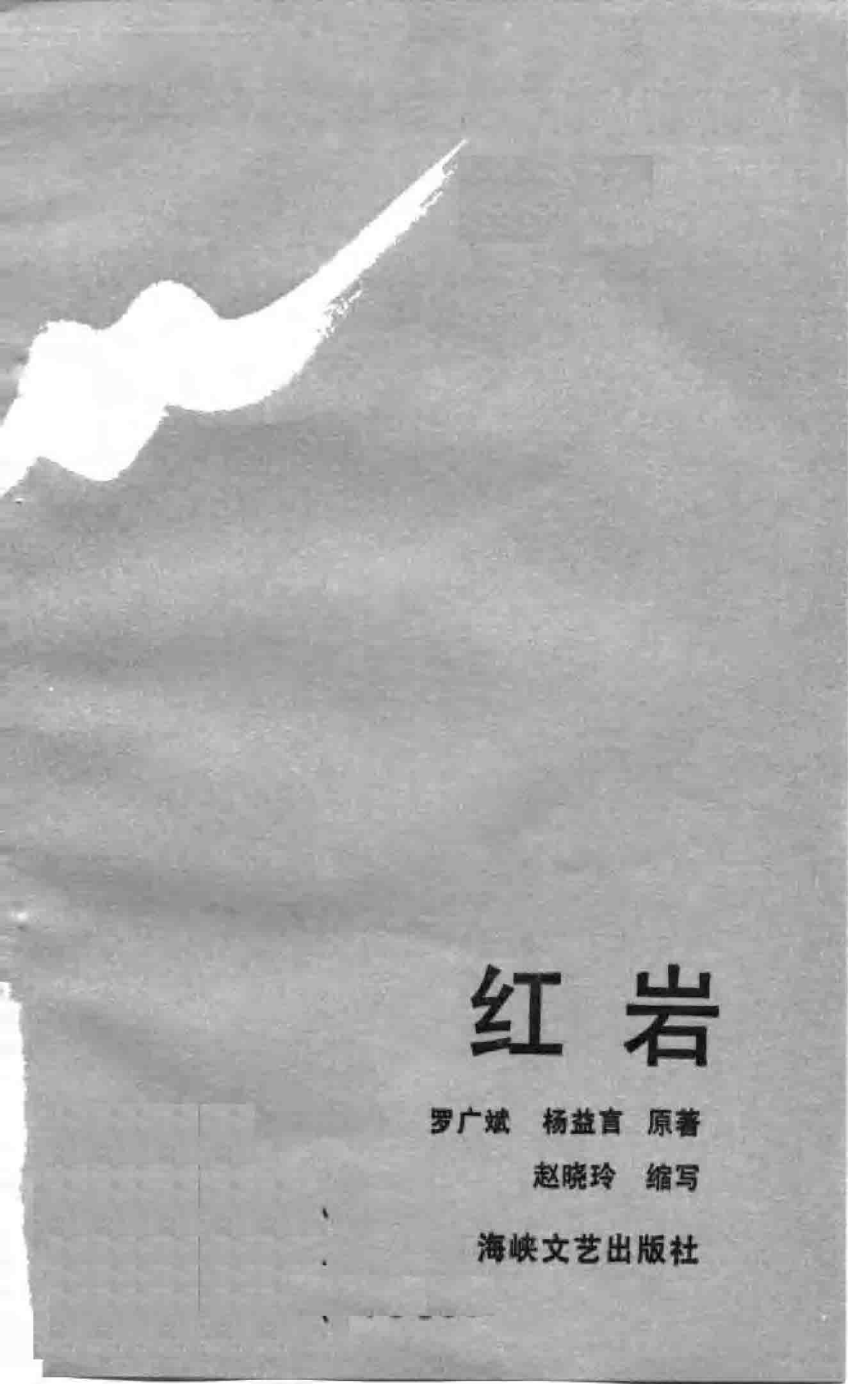


紅岩

罗广斌 杨益言 原著
赵晓玲 缩写

.5
3

HONGYAN



红 岩

罗广斌 杨益言 原著

赵晓玲 缩写

海峡文艺出版社

红 岩

——中外名著缩写丛书

罗广斌 杨益言著 赵晓玲缩写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5印张 2插页 105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80534—331—4

I·296(闽)/05 定价: 2.15元

序

郭 风

文学艺术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内所能引起的效应，历来为有识之士所关注。

就我国而言，自古有诗教之说。诗歌和音乐以及舞蹈，大约可说是远古先民最初的文学艺术活动。古人搜集和汇编流行于民间的诗歌，并从而认识到诗歌对于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改善，以及对于人的本体素质的充实和提升，均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譬如，孔子便提出有关诗的“兴”、“观”、“群”、“怨”说；他甚至提出“不学诗、无以言”的见解。孔子有关文艺的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启发了后来文艺理论家以至诗人、作家的文艺观。当然，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地在我国居于统治地位，我国古代诸多文论所提出的有关文艺的价值标准乃至作家的创作实践，免不了服从于、受制约于古代的封建政治需要和道德规范。然而，不论如何，文艺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效应，它对于世道人心所能引起的作用，即它的教育作用，很早便已经被认识

了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诗人，几乎无不是有所为而作，即无不以把握自己的作品使之有补于世道人心为己任。历史上更有不少民族英雄写出可歌可泣的诗文，用生命和血写出文学作品，激励后人。屈原、杜甫乃至陆游以及岳飞、文天祥乃至现代谭嗣同等的诗文，不用说，是鼓舞、激励千秋万代我国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力量。我国的小说出现较晚，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乃至《西游记》等，无疑地具有极深刻、极高的认识社会生活的价值，其中不免含有某些糟粕，但就总体来说是内容丰富的教科书。“五四”以后，我国的新文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指导，作家更是自觉地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现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和鼓舞力量。这种文学思想，七十余年来，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一直成为文学领域的主流，其中出现不少优秀作品。

以上所述，仅限于我国。而我又以为，在世界范围内，文学的社会效用以及对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作用，同样是历来为各国有关之士和作家本身所深切认识和执着地把握着的，从而出现众多的优秀之作、传世之作，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和鼓舞力量。

为使文学作品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方面起到它的应有作用，为有意识地、有计划地通过文学作品，向青少年以及一般读者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把公认的、现当代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编成丛书出版，我认为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这种出版构思是颇为可取的。现在，他们已邀请专家，把曾经在群众中间引起重大思想影响的作品，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青年近卫军》和《青春之歌》、《红岩》、《敌后武工队》、《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进行缩写，并加评介，作为第一辑（第一批）首先出版。读者读了缩写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艺术享受和思想熏陶。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引起全国青少年和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广泛注意和欢迎，必将引起深远的社会影响。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悲壮诗篇

——读《红岩》

陈 纾

本书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在《关于小说〈红岩〉的写作》一文中说道：“严格说来，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不是我们，而是无数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是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无数先辈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和鲜血谱成的壮丽诗篇。

小说以主要篇幅展现了1948年春至1949年11月发生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一场严酷的狱中斗争。在当代文学史上，描写狱中斗争生活的小说并不鲜见，但《红岩》却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

作者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解放后又作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他们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基础，进行艺术构思和概括，倾注了对烈士的敬慕、沉痛和炽热的感情，写出了这部优秀之作。它热烈地颂扬

了革命前辈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对革命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品首先为我们展示了这场斗争特殊的历史背景。从1948年到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但却是狱中这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备受折磨、历经严峻考验与悲壮献身的一年。这期间，我解放大军正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镇，埋葬蒋家王朝指日可待。在形势的全局上是敌弱我强，但在中美合作所这个局部的特殊战场上却是敌强我弱，山城重庆也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中。

这种特殊的背景决定了斗争的方式更加尖锐严酷，更加曲折微妙。敌人越临近死亡，就越想在全局的劣势中取得局部的优势，就越在绝望中挣扎，越疯狂越残酷地迫害革命者，直至采用活埋、丢入镪水池等绝灭人性的手段企图集体枪杀革命斗士。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正面表现敌人在垂死前的疯狂挣扎，对共产党员的折磨与戕害。同时，又从不同侧面，揭露了敌人狡滑、阴险的一面。徐鹏飞、沈养斋和那些特务爪牙们，千方百计地在革命者中间找寻一切可以打开的缺口，妄图获取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的名单和监狱党组织的情况。

这种特殊的斗争环境，要求革命者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警惕性，非凡的机智和果断，时刻注意敌人的阴谋诡计，利用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无论是许云峰检查书店工作，从细微的迹象里发现隐藏特务的危险；无论是江姐在码头上轮船时对甫志高的提醒；也无论是许云峰、成岗被捕后与特务的各种形式的较量，……这一系列事件都形象地表明了地下斗争和狱中斗争是每个神经末梢都动员起来的心理斗争。特别是最后，狱中的革命战士，一方面从我军越来越近的炮声中受到鼓舞，暗中互相传递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敌人大屠杀的不可避免。在对外联系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从敌人的行动中精确地分析判断形势，准备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举行越狱暴动。这场越狱暴动，把黎明前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推上了新的顶峰。最后，齐晓轩屹立在巨大高耸的红岩之上，吸引着敌人的全部毒弹射击，掩护同志们前进。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齐晓轩那屹立的身影。因为这身影，凝聚着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和献身精神。这种品质和献身精神正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价值所在，也是构成这悲壮诗篇的最重要的内涵。

整个革命阶级的辉煌胜利和革命者个人慷慨悲壮的牺牲，构成了齐晓轩等共产党人的特殊命运。这时每个革命者都面临自己的生死问题。

他们渴望自由，多么希望见到红旗在新中国升起的这一天，因为这是他们为之奋斗献身的目标。但是，他们又决不苟活，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他们却宁愿戴上失去自由的镣铐，“愿意把这牢底坐穿”。

他们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在如此险恶的狱中环境里，新生儿的诞生，“监狱之花”的命名，充分说明革命者顽强的生命力。然而对待死亡，他们又是那样坦然，成岗被摧残得遍体鳞伤，竟然当场写出《我的‘自白书’》那样慷慨激昂的檄文。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合作所这个“活棺材”里，很少会有人活着出去的，怕死，就一天也呆不下去。为此，每个革命者都要锻炼自己不怕死的勇气，这是一种考验。但是，他们又想尽一切办法保存自己的生命，培养自己活下去的韧性。创造条件，力避无谓的牺牲，为党继续工作，这又是一种严正的考验。最后，一旦革命需要，他们又义无反顾地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生死观。

这之中，最感人的莫过于许云峰、江姐和华子良的形象。

许云峰是职业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地下党工运

书记。他一出场，就显示出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共产党员的特有品质。这时，他正置身于一个严重关头。备用联络站沙坪书店已暴露，特务的魔爪正伸向党的秘密机关。许云峰发现情况反常，当即采取断然措施。随后，在新生茶园突遇叛徒甫志高带着特务来搜捕，许云峰为了保存组织毫不犹豫地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安全脱走，自己则迎着危险走去。

被捕以后，他又和特务头子徐鹏飞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精神战斗。面对徐鹏飞的威吓，四十八套美国刑具，他毫无惧色。他被严刑拷打得奄奄一息了，但在抬进监狱的第二天清晨，就坚持站起来，用散步的脚步声向同志们示意，说明自己活着！

在渣滓洞的绝食斗争、龙光华烈士追悼会、春节联欢会等生死抗争中，他都是领导者与组织者。

关进“白公馆”的地牢里，在无边的黑暗和与世隔离的孤独的困扰中，他用指甲日复一日挖开洞壁的石条，为战友日后暴动越狱留下通道，再次把“生”留给别人，而自己却安然等待就义。

这是何等高贵的“生能舍己”的精神！

江姐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共产党员。她性格温文尔雅，待人和蔼可亲，生活上爱整洁，即使在狱中也同样如此。但在对敌斗争中，她却是那样坚强机智，宁折不屈。小说对她的描写有几个场面是异常

感人的。

江轮遇敌，她神态自若，镇定万分，完全不把敌人的搜查放在眼里。

上华蓥山根据地去，即将和既是丈夫又是战友的彭松涛重逢，相聚在一起过新的战斗生活。此刻，与丈夫分别一年多的江姐真恨不得马上飞到山上。谁能想到，她突然看到的是城头上惨遭敌人杀害的彭松涛的头颅。她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但事实却是那样严酷无情。她头晕目眩，胸口梗塞，无力站稳脚跟，真想恸哭一场。但她毕竟不是一般的女性。她既有着妻子温柔深情的心，更有着巨大的革命意志力。她终于再次抬起头来，望着雨雾濛濛的城楼走了。

这里，小说通过江姐的“脚步”来揭示她的心理流程。在巨大的悲痛袭击下，开始，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而毫无所知。到后来，她以理智克制了感情的波涛，把永世难忘的痛苦深埋心底，进而化悲痛为仇恨。那越走越急的脚步便是这种心绪的写照。上山以后，“老太婆”的“只剩下孤儿寡妇一样闹革命”的革命信念，进一步成了她精神力量的泉源。这一段，江姐由强烈的期待、热情的向往，到意外的波折和打击，由剧烈的痛苦到进一步振奋精神，可以说构成了全书心理描写最精彩的片段，是悲壮诗篇中最动人的乐章。

江姐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了。严刑拷打，竹签钉手，十指连心的剧烈疼痛，丝毫也不能使江姐开口。江姐即将就义，这时黎明就在眼前，她已经看见晨曦了。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时刻。但她没有任何悲伤与恐惧，从容地梳理她的发丝，换上蓝色的旗袍，披起那件红色的绒线衣，习惯地拍拍身上干净的衣服，再用手熨平旗袍上的一些褶皱，深情地与同志们诀别，庄严地走上刑场。她为新世界诞生而慷慨献身的誓言，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上：“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读完《红岩》，也许华子良留给你的印象并不亚于许云峰和江姐，因为他的形象自有其特别感人的地方。

试想，他，原来是华蓥山根据地的党委书记，被捕入狱十五年。从1946年起，接受省委书记罗世文临刑前的指示，伪装疯癫，长期隐蔽。从此，在同志们心目中，他是个一听到枪声就变成疯子的胆小鬼。甚至在成岗这样老练的革命者心目中，他也是个疯癫胆怯而又衰迈的可怜虫。他经受了多少委屈，迎来了多少同志鄙夷的目光，“象个泥塑木雕的哑巴”。

三年的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华子良默默地承受着敌人的侮辱，深深地埋藏着自己的情感，

这是需要一种极大的坚韧的毅力才能做到的。一直到了最后，党需要的关键时刻，他才一扫疯疯癫癫的模样，呆滞的目光变得炯炯有神，充分发挥蕴藏多年的力量，这是又一种多么可贵的“生能舍己”的精神啊！

小说的艺术结构错综复杂而又浑然一体。它所描写的斗争生活和事件，错综交织，人物众多，场景变化频繁。作者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斗争为主，展开了对当时山城重庆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有三条斗争线索，一是城市工人、学生运动，二是华蓥山根据地的斗争，三是狱中斗争。这样就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以一定的深广度再现了国民党反动派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性胜利的时代风貌。另方面就写狱中斗争为主来说，又表现了这场斗争与城市地下斗争、农村革命斗争的联系。

在具体安排上，作品的前十章（缩写本的前五章）侧重写狱外斗争，后二十章（缩写本的后十章）写狱内斗争，前者是后者的引线，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作品以一些关键人物的活动为线，牵引出并连结起复杂多变的斗争生活，如兵工厂的斗争由江姐与成岗的联系引出，华蓥山根据地的斗争由江姐的工作调动引出；陈松林引出学校风潮与

甫志高的叛变，甫志高的叛变导致许云峰等人的被捕，很自然地将狱外斗争转向狱中斗争。而刘思扬的被捕后的“释放”又被捕，则联结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斗争，等等。

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是《红岩》艺术上的又一特色。作者善于捕捉富有表现力的细节，传神地再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上面提到的对江姐脚步的动作描写就是一例。作者特别善于描写人物的眼神。如隔离在楼八室的许云峰，用目光与战友交流情感，使战友们从中感染了沉毅坚定的力量。另一方面直接的心理描写在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如对龙光华、小萝卜头等人梦境的描写。小萝卜头多想出去看看热闹的街市，但他梦中的街市却象监狱一样阴森可怕。这是敌人在幼小心灵里投下的恐怖阴影的折光，这些心理描写又往往与环境气氛的烘托相配合。再如以监狱阴森、冷酷的气氛，反衬革命志士意志昂扬、火热的斗争激情。新年联欢的气氛，烘托出革命志士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等等，都很有表现力。

传神笔法和心理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在特殊环境里革命者的精神世界。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革命者没有公开表达自己情感的自由；这里的斗争是“神经未梢”的战斗，因而，他们必须充分发挥视觉、听觉、触觉和可以传递表达革命之情的细微动

作的作用，充分发挥观察、思考等脑力活动的作用。所以从另方面说，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正是特殊的生活真实所决定了的。

《红岩》自1961年出版以来，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先后发行近五百万册。粉碎“四人帮”后，再版又发行了近二百多万册，其它不同文字的译本达十种以上，我们从此可以看到它的创作成就。

而这一创作成就的获得，与本书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很早就投身于学生运动。1946年初，组织上派他去滇南一个县以教书为掩护，准备开辟农村工作。后来，又受组织委派到重庆、川东工作，由江竹筠同志（江姐的原型）介绍入党。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

杨益言，1925年生于四川重庆。早年曾受“工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于1943年入同济大学读书。不久，“工业救国”的迷梦就被现实击碎了。从而他积极参加反美蒋的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被同济大学反动当局所开除。1948年回到重庆一工厂工作，被特务跟踪逮捕，囚禁于“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

杨益言入狱后不久，就得知罗广斌同志原来是当时国民党兵团司令罗广文的弟弟，对他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行动深感敬佩。两人在朝夕相望的邻近牢房中，陌生感很快消失，遂成为并肩斗争的战友。在狱中，他们被这场瞬息万变、扣人心弦的特殊战斗所吸引，耳闻目睹江竹筠、许建业（地下党重庆市委工运书记）等许多革命先烈与革命志士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真正感受到他们那“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的慷慨悲壮的情怀。重庆解放前夕，他们九死一生，从越狱暴动中脱险生还，罗广斌还是白公馆最后一次越狱斗争的组织者呢！

建国后，他们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从掩埋烈士的遗体，寻找烈士的遗物，到搜集烈士生前的斗争事迹，他们进一步接触到许多过去根本无法了解到的惊心动魄的情况，加深了对集中营里那场生死搏斗的认识。

1957年，他们与刘德彬合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广大青少年中引起的反响十分强烈。1958年—1961年，他们又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补充、再创造，开始了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

十年浩劫期间，《红岩》和其它许多文艺书籍一样遭到“四人帮”的扼杀、囚禁。作者罗广斌被